

李兴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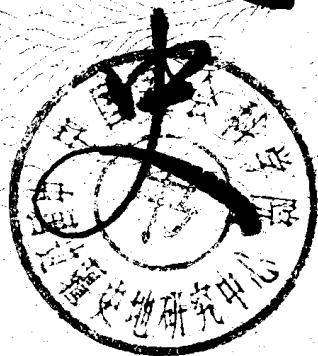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國流人史



本书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

中國流人



李兴盛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龚江红
封面设计:岳大地

中 国 流 人 史

Zhongguo Liuren Shi

李兴盛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71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38

字数:1 100 000

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500

ISBN7-207-03222-6/K·372 定价:38.00元

(黑)新登字第1号



作者简历

李兴盛,原籍山东费县,1937年11月生于哈尔滨市。现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黑龙江省历史学会理事,黑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兼职研究员,(辽宁省)东北教育史研究所客座教授,《全清诗》编纂筹备委员会副主任,《黑水丛书》编委会常务编委。1990年末被评为省级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1992年冬被国家人事部批准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东北古代史、中国流人史及东北文献之研究。专著《东北流人史》曾获国家级与省级多项奖。迄今为止,独撰、合编之书已出版的计12部,发表文章50余篇。

目前正与学术界同仁致力于流人史这种新的史学体系的创建与《全清诗》的编纂。

序

钱仲联

中国流人之通史，前古未有也，近始有之。奚所昉？李君兴盛为之昉。李君有感于中国流人具有开发边疆、传播中原文明之巨大贡献，并为创建流人史此种新史学体系与学术流派，辄以“十年磨一剑”之雄心壮志，披荆斩棘，辛苦耕耘，终于撰成《中国流人史》一书。流人之称，古含二义，一谓流亡于乡里以外之人，如汉桓宽《盐铁论》所云“则百姓足而流人归其田里”，刘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刘峻注所云“《永嘉流人名》曰”是也。一谓被流放贬逐之人，《庄子·徐无鬼》云：“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陆德明《音义》：“流人，有罪见流徙者也。”《隋书·刑法志》引《齐律》所谓“二曰流刑，投于边裔，以为兵卒”。《汉书·元后传》载王凤上疏所云“臣犹自知当远流放”者是也。如《尚书·尧典》所云“流宥五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史记·夏本纪》所云“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者皆是。至后世则有无罪而当国者滥诬以罪而被流放者矣。今李君之撰《中国流人史》也，乃取第二义，纪流放贬谪之人。斯则中国数千年自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一血泪斑斑之痛史也，亦数千年流人开发边裔之纪念碑也。虽曰流人史，其用意固有更大者在焉。联今获读此书校样，如入金山，触手皆宝，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其选题新颖，识见超俗，内容形式均新人耳目，开拓创新，贯串全书，而叙事有法，取材宏富，亦令人叹服。此书出，中国流人之历史作用，得以大显于世，学术界一种新体系与学派之创建，亦得以奠基于是，此书诚为有功学苑、传世无

疑之巨著也。

李君胸蟠万卷，具史家才、学、识之长，殚精于中国流人史及东北文献之探讨者有年，著述等身，其专著《东北流人史》等七八种，饮誉已非一朝。近且任《全清诗》编纂筹委会副主任，《黑水丛书》编委会常务编委，此皆传世之巨编，力薄者固难肩此重任。国家人事部定君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岂非实至名归者欤！联与君前虽未尝通函，然神交已久，曩年编《清诗纪事》及选注清人诗词，取资于君《边塞诗人吴兆骞》诸书者非鲜。今君以此一百余万言之煌煌巨著属为引咍，虽老病不斟，奚敢以不文辞。

岁在阙逢闾茂，玄月，钱仲联书于苏州大学中国近代文哲研究所，时年八十有七。

艰难创业话流人

(自序)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离骚》

世界各国都曾产生过大批流人，乃至许多著名流人。在国外，如列宁与拿破仑一世就是这类流人的典型。缔造苏维埃政权的杰出革命家列宁，曾被沙皇政府流放至西伯利亚，在那里散布了革命火种。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在欧洲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一世之雄拿破仑，曾两次被流放海岛，并最终凄凉地死在圣赫勒那岛，结束了威武荣耀的一生。在我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屈原、李白、柳宗元、苏轼、王守仁、林则徐等，也都是著名流人。这些流人坎坷悲惨的遭遇与可歌可泣的业绩，千百年来，成为诗歌、小说、戏剧、美术、音乐创作的一种动人素材。为了弘扬我国历代流人开发边疆、传播中原文明的业绩与艰苦创业的精神，我以近十年的辛苦耕耘，撰写了《东北流人史》。

《东北流人史》于1990年冬出版后，以其选题、内容与形式的开拓与创新等特点，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甚至一些著名学者（如罗继祖、钱仲联、张博泉、何龄修等教授及日本明治大学神田信夫教授、德国格延根大学优翰教授等），著名戏剧理论家与作家（如余秋雨先生等），都撰写诗文，予以评介、推奖或引用。同时还获得了国家级及省级多项奖。随着新华社将获奖消息向海内外的播发，

有些读者来信，询问我今后的研究计划，我告知他们，正在撰写《中国流人史》一书。他们又询问我为什么这样喜欢流人史？研究流人史的动机是什么？

关于这一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我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无到有、由模糊到明晰的逐步深化的过程。现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这一问题。

（一）艰难创业话流人

我为什么研究流人史？关于这一点，在拙著《东北流人史》之“前言”中，已有所涉及。内云：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流人，或家破人亡，单车出塞，或背井离乡，全家远戍，带着身体上的鞭痕，心灵上的创伤，万里迢迢地来到这举目无亲、榛莽未辟的荒凉塞外，像任人宰割的牛羊一样，作为奴隶与犯人，被强制地在这白山黑水的大片土地上，胼手胝足，世代辛苦地耕耘着。他们及其子孙，泪洒冰天，血沃荒原，为东北边陲的开发与保卫，民族的团结与融合，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他们的绝大多数，却永戍不返，葬身异域。不仅其事迹，甚至其姓名，也随着斜阳蔓草，荡为冷雾寒烟，而湮没无传。于是，我在崇敬之中，又平添了无限感慨。基于此，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一种事业上的责任感，促使我决心为这些流人，谱写一部史书。这样，撰写《东北流人史》，就成了我的一项科研主攻任务。

“筚路褴褛，以启山林”。创业是何等的艰难啊！

在漫长的古代，广大流人从中原各地来到荒凉僻远的东北边陲，触目是冰天雪地，冷雾寒烟。塞月凄凉，边风呼啸；虎狼成群，榛莽未辟。他们生活在这里，劳动在这里，又葬身在这里。处境的艰辛，是无法言喻的。

而从中原流徙向我国西南、西北、东南广大地区的流人处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西南是蛮烟瘴雨，古木参天，蛇蟒出没；西北是

大漠连天，惊沙蔽日，千里无人；东南是飓风拔树，海走山飞，云涛波诡。又是何等的险恶，何等的艰辛！

但是，创业的艰苦，不仅体现在自然条件与环境上，而且还体现在政治因素上。作为罪犯，广大流人要被强制迁徙，强制戍边或服役，饱尝凌侮，受尽非人折磨。有些流人及其子孙还要终生或世世代代为奴。对他们来讲，环境与命运是何等的残酷！这正如诗人吴梅村送吴兆騫出塞诗所描绘那样：

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

广大流人就是在这种艰苦逆境与悲惨命运中，泪洒苍天，血沃塞土，为祖国边疆的开发与保卫，为中原文明的传播，民族的融合与团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瘴雨蛮烟冰雪地，艰难创业话流人。

为了弘扬先民创业的艰难，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我不能不为这些开发边疆的先驱者谱写一部史书，这就是我研究流人史的最初动机。

（二）天下才子半流人

一次，我的友人《金史》专家许子荣同志在谈到拙著《东北流人史》时，认为我的研究抓住了一个好选题，因为“天下才子半流人”。这种才子，并非才子佳人那种所谓“才子”，而是真正才华出众之人。我听了他的发言，颇受启发。

流人中确有许多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并卓有建树的文人、学者，也有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如屈原、苏武、李白、柳宗元、韩愈、刘禹锡、李煜、宋徽宗、苏轼、黄庭坚、文天祥、杨慎、王守仁、纪昀、林则徐、邓廷桢等，都可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流的诗人、作家、学者或民族英雄，此外，流人中还有许多书法家、画家、艺术家乃至科学家。如戴梓与王贞仪就是诗人兼科学家。而纪昀笔下的以楚声为艳曲的何奇、昆曲表演家程四、擅长说书的艺人孙七、善于修理钟表的工匠方正等，都是社会底层的人中之杰，是流人中

的真才子。他们之中，有的在戍所撰写了大量诗文或著述，为后人研究我国文学史、文化史、边疆开发史与民族关系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文献。有的在戍所发明或创建了某种学说或学派，在我国学术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有的为反抗外国侵略者与捍卫祖国领土完整，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其中典型者，如苏轼的三次贬谪（黄州、惠州、儋州），一次比一次僻远，一处比一处艰苦，但三次贬谪，却成为他创作丰收与天才焕发时期，而居官朝廷时的创作几乎是一片荒漠。据周懋昌先生统计，“黄州四年余，共有诗词文赋、小品书信等 600 多篇，在惠、儋二州近六年，单诗歌就 400 多首”。同时，这期间又完成了《易传》7 卷、《论语说》5 卷、《书传》13 卷三部学术专著，“可谓硕果累累”。^① 其中有些创作如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等，都成为千古传诵的名作。又如杨慎流放云南时，著述竟然多达 269 种，可谓惊人。^② 难道这类才华横溢、著述等身的学者文人，不是真正的才子吗？另如王守仁贬居贵州龙场驿的万山之中，一个夜间，在长期探索基础上的哲学观点，突然彻悟而成，这就是后来曾一度风靡两京的阳明学说。尽管这种学说是主观唯心主义，但它及以它为基础的阳明学派，毕竟在我国哲学史、思想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难道这种学说与学派的创始人不也是另一种类型的才子吗？

由上可见，“天下才子半流人”，决非虚语，它是流人中人才倍出的形象概括。既然流人队伍是人才倍出，我为什么不去讴歌这些社会底层（或一度是社会底层）出身的才子呢？

（三）人才原自苦中来

为什么流人队伍会人才倍出？为什么天下的才子多出于流人呢？也就是说，流人中的才子究竟来于何处？

只要考察一下我国流人史，不难发现，流人终身的业绩与贡

^① 周懋昌：《二十四字论平生》，载《文史知识》1993 年第 7 期。

^② 王文才：《杨慎学谱》。

献,即其成才,往往是在流放时期的逆境之中。也就是说,流人中的才子几乎全部产生于流放时期。这种逆境出人才的客观事实,连某些流人自己也有所体会。如苏轼自海南赦归后写的《自题金山画像》诗,就曾自问自答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见他也把完成大量诗文著述的三州之贬谪,看成是终生功业与贡献最大时期。这种事实表明:天下才子多出于流人的原因与流放有关,即流放期间的艰苦、困厄与忧患的逆境玉成了他们。

艰苦的条件,困厄忧患的环境,固然会使一部分人意志消沉,信心丧失,无所作为。但却使大多数人受到锻炼与磨砺,增强斗志,奋发向上,有所作为。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就是说,承担大任之人,必须首先历尽艰苦。可见艰苦的磨练,对于人才的成长是至为重要的条件。宋代学者张载也说过:“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贫贱与忧戚等,既然能常常地玉成于人,不也是指艰苦困厄对于一个人的成才所起的促进作用吗?一般人是这样,文人学者也是这样。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曾被诬下狱,后来在写给友人任安的书信中,感慨地道: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艰苦的条件,可以玉成与造就人才;困厄忧患的逆境,也可以产生大批传世杰作。难怪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也说过:“诗,殆穷者而后工也!”我们认为,不仅诗文“穷而后工”,而且著述也是“穷而后佳”。

总之,非常之人,可以建非常之功,立非常之业,撰非常之文。而非常之人,又必须经过艰苦之磨练。这一结论,对于流人中的文人学者来讲,尤为明显,因为流人是遭遇艰苦、困厄与忧患之大者。

流人中的文人学者,几乎全部出身于官宦人家或书香门第。阶

级出身与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脱离社会，脱离人民，因此其诗文固然有些是不乏形式典雅，词藻华美之作，但内容苍白，无病呻吟，没有现实意义与生命力。艺术上也多矫揉造作之弊及斧凿之痕。可是他们一旦变成流人，从剥削阶级成员变成阶下囚，犹如从天堂坠入地狱，就失去了昔日的荣耀与地位。由于长期生活在下层人民中间，“极人世之苦”，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与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必然为他们的诗文创作或学术研究，开拓了新的天地与新的途径，提供了新的素材，从而使之创作出大量具有新的意境、新的风格的现实主义诗文。而多种多样的社会实践，又会促使他们撰写出许多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著述，甚至创建了某些有影响的学说学派。而这些诗文著述或学说学派，又正是这些流人人生道路坎坷、饱经忧患、劫后余生的产物，可见艰苦的条件玉成了他们。

这一点，前人也有深刻理解。如清代乾隆年间学者靳荣藩在评价清初被人誉为“惊才绝艳”、“一代奇才”的著名东北流人吴兆骞时说道：“汉槎（兆骞之字）极人世之苦，不如此，无《秋笈》一集，其人恐不传。”其意是说，吴兆骞倘如不遭流放之苦，就不会有其著述《秋笈集》，其人也绝不会流传后世。言外之意，是说艰苦玉成了他。

总之，人才原自苦中来，即逆境出人才。整个流人史就是有力的历史见证。为了证明这一真理，又使我逐渐萌发了研究流人史的第三个动机。

（四）为创史坛新体系

迄今为止，我国史学领域还没有流人史这一分科，各种图书目录或论文索引之分类自然也不存在流人史这一类，涉及到流人史的论著，分别被安置到移民史、经济开发史、文化史、刑法史或人物传记等类之中。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深深地感到流人史应该从上述诸史中分离出来，单独成为一种新的史学体系。这种新体系的创建，有其必要性与可能性，也是由学术研究本身的独创性决定的。

首先,这种体系建立的必要性。

作为阶级专政的对象及统治阶级掠夺财富或实边戍边的需要而产生的流人,固然与受天灾人祸或战乱等因素影响而自动流徙他乡的流民截然不同,就是与在统治阶级招徕政策之下有计划有组织的人口迁移的移民也迥然有别。可见,它是一种特殊的移民,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同时,流人史的研究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很大的现实意义。学术价值不仅体现在它可以促进我国边疆开发史、民族关系史、文化史、移民史与法制史的研究,而且也可以填补流人史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现实意义体现在:弘扬流人的艰苦创业,可以提高广大人民对于艰难创业的认识;讴歌流人队伍倍出的人才,可以提高人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观念;论证艰苦条件对于人才产生的玉成,可以激发人们奋发图强,刻苦钻研的精神。这样,就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开发边疆,建设边疆。

总之,这种流人的特殊性与流人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表明流人史有着自成体系的必要性。

其次,这种体系建立的可能性。

流人史研究的领域是非常广阔的。它可以分为通史、断代史与专题史三种类型,而每种类型又可以各自分为全国性与地方性两种。全国性通史可名为《中国流人史》;地方性通史可派生《东北流人史》、《西北流人史》、《西南流人史》等;全国性断代史可派生《两汉流人史》、《清代流人史》等;地方性断代史可派生《东北清代流人史》、《岭南唐代流人史》等;全国性专题史可派生《中国流人诗史》、《中国流人文化史》等;地方专题史可派生《黑龙江清代诗史》等。至于某些流人的评述与传记之作,可列入专题史一类之中。举一反三,还可以派生其他许多题目。可见它的研究领域是非常广阔的,而这种广阔性又使流人史有着自成体系的可能性。

再次,学术研究的独创性。

实践证明,学术研究必须有大的创新与大的突破。如果没有这种创新与突破,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人云亦云,或仅仅作

些拾遗补阙的工作，^①那么，这种学术研究便会失去其生命力与存在价值。如农民战争史热时，都去搞农民战争史；文化史热时，又都去研究文化史……有关这些史或这些史中某一具体研究课题的第一部书是开创之作，后几部书也具有程度不等的开拓性，可是后来越来越多的效颦之作，其开拓性就越越来越小，并最终趋于无，这类著述，只是东抄西拼，拾人余唾，又有何种价值可言呢？总之，治学应该走自己的路，独辟蹊径，别具特色，追求创新与开拓。

至于中国流人(包括流刑)的研究，从前一直为人们所忽视。据我所知，1949年之前，仅有日本学者有高岩与我国学者谢国桢先生。1949年之后，虽然形势渐好，日本有川久保悌郎，我国东北有张玉兴、杨旸、梁志忠，西北有齐清顺、周轩，西南有王文才、古永继，东南有朱玉书，北京有叶志如，山西有张铁纲，此外还有马新等同志作了许多探索与尝试(最近何龄修等先生也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基本是从刑法史、文学史、移民史、边疆开发史或历史人物传记的角度出发的，没有，也不可能提高到流人史的角度。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人真正提出过流人史这种新的史学体系的设想，即还没有人有意识地将流人的研究纳入到流人史这种新的史学体系的轨道与范畴之中。因此，我国流人史的研究，还仅仅是开始，还需要多方位、深层次、系统化地开展下去。

总之，创新才有生命力，开拓才有存在价值，而流人史正是这种从内容到形式，从选题到写法，都新人耳目的学科，是独辟蹊径，别具一格的独创性新学科。因此，创建这一新的史学体系，成为我研究流人史的另一动机。

由创建新的史学体系的动机，使我联想到还应该创建一种以流人史研究为中心的新的史学流派。倘若这种新的史学体系与史学流派能够创建成功，不仅会扩大史学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会促进

① 我是说“仅作些拾遗补阙的工作”，并未否定“拾遗补阙”工作的必要性。

史学研究的发展。

我这种大胆的设想,也许是幻想,甚至过于狂妄。但是总比不利于学术发展的墨守成规、因循守旧为佳。因此这种设想即使过于狂妄,不能实现,也应该有其可取之处。

记得有人说过,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也就是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对于流人史的研究也是这样,就像流人创业那样艰难,建立一种新的学术体系与流派也是颇为不易的。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与我的同仁,充满信心,以坚韧不拔与锲而不舍的毅力,在茫茫的史学原野上大胆求索与奋勇前进,最终一定会走出一条路子,经过崎岖的山路,会攀登到希望的顶峰!

综上所述,为了弘扬流人创业的艰难,证明流人队伍人才倍出的现实,论证艰苦条件对于一代人才的造就与玉成,同时为了创建一种新的史学体系乃至流派,决定了我对流人史的研究与探索。

如前所述,广大流人在艰难创业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流放中产生了大批的人才,但是决不能因此得出流放本身是一件好事的结论。

余秋雨先生说得好:“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①是对人的肉体与精神,人的创造力与天才的一种摧残。我们虽然能举出大量例证,证明广大流人对开发边疆,传播中原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流放中的艰苦对于天才的产生起到了玉成作用,但是,由于这种贡献与作用并非出于流人的主观动机,而是在客观上产生的效果,因此可以说这种贡献与作用并未达到顶峰。也就是说,倘若对这些流人不是采取流放这种惩罚方式,而是其他方式,使之接触社会,深入生活,接受艰苦的磨练,我想,他们所做出的贡献与所发挥的作用会更大,他们之中产生的人才会更多。流放不是一件好事,但流人却在艰苦的流放时期作出了巨大贡献,产生了大批人才。这两件事表面上看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并不矛盾,而

① 余秋雨:《流放者的土地》,载《收获》1993年第2期。

是辩证统一的。既应看到流人在客观上已经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时又应看到由于流放的摧残，致使这种贡献远未达到，也不可能达到顶峰。问题应该这样去看待。

* * *

研究帝王将相、社会名流的文献数不胜数，可谓俯首即拾，而撰写《流人史》却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难度大的原因主要在于流人文献的极端缺乏。就全国流人来讲，虽然产生了许多第一流的诗人、作家、学者、民族英雄等，他们的事迹较易考查。可是他们的人数毕竟不多，与数以千百万计的流人整体相比，仍是不成比例的。而绝大多数流人，尤其是出身于普通劳动人民的流人史料却是为数甚少，且又极为分散（文献散居全国各地，流人事迹散见群书），记载又多点滴、零碎，很少有较长，较完整的记载。同时，这为数有限的史料，有关流人的记载，又仅详于流人流放前的事迹，而于其流放后的行实，不是语焉不详，就是根本不载，而且以根本不载者为多。这是因为，一个人一旦成为流人，也就成了奴隶与罪囚。对于奴隶与罪囚，一般人谁敢，谁屑于去记载其行事？即使有人打算去记载，也由于许多客观条件所限，难以搜集流人流放后的资料，而又无从着手。基于此，绝大多数塞外流人的事迹，甚至其生命，都湮没在塞外的冰天雪地、蔓草荒烟之间。即以大诗人李白为例，其流放前后的行事，诸书均有记载，可是唯独其流放中的行事，诸书多未涉及，即使偶有涉及者，也是语焉不详，互为矛盾。最为著名的流人是如此，其他流人更可想而知了。

基于此，搜访流人之著述与资料，实非易事。往往从数函线装书中，能查出一二则有关的零星记载，就喜出望外了。文献之缺乏，决定了搜集资料之艰难，并决定了研究难度之大，尤其是研究流人流放后的行事，难度更大。这一点，不当其局者，难知其中的甘苦。

* * *

八十年代初，我在我国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先生的支持下，开始研究东北流人时，还没有研究中国流人的精神准备，因此阅读《明

实录》、《清实录》与《二十四史》等书时，仅摘录了东北流人的史料，其他地区的流人史料基本未涉及。后来到1987年，随着研究的深入，萌发了继续研究中国流人史的想法，于是才开始注意这方面史料的收集。

1989年秋冬之交，《东北流人史》刚一脱稿，我立即全力以赴地转入中国流人史的研究。为了撰写《中国流人史》，我再一次阅读了全部《明实录》、《清实录》及《二十四史》。尤其是《清实录》中的中国流人史料，作了全部摘抄。同时，又翻阅了大量其他史料。正史之外，在杂史、载记、方志、笔记、别集、总集、文话、词语、诗话、书目、类书与丛中辑录了大量有关史料。在这种基础上，我撰写了《中国流人史》。

总之，我从事中国流人史的研究，至今已有六七年，倘如从研究东北流人史算起（因为东北流人史是中国流人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则已达14年。今后，我仍想就与流人史有关的课题继续研究下去。

* * *

十三、四年来，我在流人史的史料搜集、考察与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过许多专家、学者与友人（其中尚有至今不相识者）的帮助，他们有的提供史料、图片或实物，有的来信提出许多宝贵性建议或给予鼓励。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崔健英、南京图书馆宫爱东、上海图书馆王翠兰、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张文玲、上海教育学院图书馆方承、吴江县图书馆吴中荣、东北师大图书馆刘奉文与苏铁戈、黑龙江省图书馆梁信义、黑龙江大学图书馆何俊芳与田书兰、哈尔滨市图书馆陈爱燕与林学军、哈尔滨师大图书馆赵克与崔世勋、黑龙江省社科院图书馆张瑞玲、辽宁省社科院张玉兴、吉林省社科院杨畅与梁志忠、新疆社会科学杂志社齐清顺、新疆大学周轩、新疆考古所张玉中与祁小山、浙江大学朱则杰、黑龙江省志办杨趾范、黑龙江省社科院许子荣、张凤鸣与孟广耀。还有东北著名流人张缙彦之后裔张善良、清代东北流人程煥家乡（安徽天长）后学徐传林、